

第三章

战时的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

第一节 太平洋国际学会与国民政府

一 战时中国分会的艰难处境

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已经历了近十二年的发展，达到了其成熟时期，分会选派代表参与的历次国际会议在国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分会聚集了一批经济、社会、国际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优秀学者，它从1920年代末年起开始进行的各项调查研究工作到1930年代中期以前，进入了完成阶段。近十二年间，中国分会亦曾常面临困境，特别是因其源起于国民外交的理念，希望通过与他国国民联络感情以实现和平，并充当对外宣传的工具及政府外交政策的奥援。而这种设想未免理想化，并且在当时东亚剧烈演进的国际形势下，几位民间的学者、社会活动家在外交方面也难以取得实质的收获。而且，作为一个民间团体，在国际论坛上讨论废约、中日关系这类敏感问题，常受到来自国内舆论、甚至政府的压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甚至根本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

战争则使中国分会面临更大的困境。

1. 战争的影响

抗战期间，作为一个民间学术组织，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同其他学术机构及社会团体一样，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一些研究工作不得不中辍，学会自身及其会员个人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胁，学会甚至数度濒临解体。

方显廷在回顾抗战对于中国经济研究之影响时曾说道：“随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发生之后，中国经济研究工作，亦遭受空前的打击，第一、大部分

研究机构均设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诸城市，战事发生后，纷纷内迁，使若干珍贵资料，失散于辗转迁徙途中，使以后之研究工作，不易继续，甚而停顿。第二、因战时通货膨胀，研究工作者之固定收入，不易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准，因而转业，研究经费减缩，工作自亦困难。第三、太平洋战事发生之后，国内交通隔绝，外国书籍、资料、研究人员不能来华，国内学人及青年学生，亦无法出国深造，国内学术研究陷于孤立状态，经济学说研究亦与国际经济思想脱节。”^①方氏所描述之抗战对中国经济研究的影响，亦反映了战时中国各学术领域，以及各学术机构所遭遇的共同情况。

就方氏及其所服务之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而言，该院及南开大学自1920年代末年起与太平洋国际学会进行合作，对于东北、华北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展开研究，该院亦成为中国分会所倚重的研究重镇之一，其院长何廉亦担任中国分会的研究主任。而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对这些研究工作产生了不小影响。例如，何廉等人在太平洋学会资助下，从1930年开始对东北移民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发表了一些初步报告，但在九一八事变后，因无法进一步收集资料，该项目不得不于1933年宣告中止。卢沟桥战事刚起，南开大学校园即遭到日军炮击，主要原因在于张伯苓（中国分会的执行委员之一）主持下该校坚持抗日立场。^②此后，方显廷等在华北的各项调查研究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大学、中华平民教育会等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下，在华北的乡村建设项目，亦在卢沟桥事变后被迫停止。

事实上，战争的影响早已显现。九一八事变后，一些东北会员如阎宝航、宁恩承、王卓敏等即被迫流亡，东北大学校园沦为日军养马场。在人员方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分会亦连连遭遇损失。1938年4月，沪江大学校长，中国分会最初发起人之一，时任分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刘湛恩遭到日伪暗杀。据刘夫人王立明说，“一·二八”事变后，刘湛恩即预感到自己或遭不测，“我已感觉到敌人对我的忌恨。第一，因为我大胆地把他们欺骗、掩护侵略的宣言，常常在国际方面驳斥，其次，这里有许多国际机关，如国际学会、国际友谊社等，我都是其中推动最有力者之一；我想他们最恨

^① 方显廷：《二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研究》，《财政评论月刊》第16卷第1期（1947年1月）。

^② 宁恩承：《回首百年》，第108~109页。方显廷：《方显廷回忆录》，方露茜译，商务印书馆，2006，第91页。

我还是每次他们派代表来见我，无论是谁，我都是一番痛骂”。因拒绝与南京伪政权合作，出任伪教育部部长，刘湛恩终遭不测。1938年夏，徐新六奉命赴美国与美政府协商对华经济援助事务，在前往重庆接受国民政府任命途中，其所乘飞机被日机击中而遇难，徐氏是中国分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在该会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他的死使中国分会遭受了一大损失。

上述事件，特别是刘湛恩遭日伪暗杀一事，使中国分会执行干事刘驭万深感不安。鉴于中国分会一向的抗日立场，他对分会及其个人安全十分担忧，因而于4月将分会办事处迁往香港。初到香港之时，他一度对中国分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心存怀疑，后经胡适及其他执行委员的鼓励，他决心继续维持分会的运转。^① 1941年年底，香港沦陷，中国分会匆匆遣散人员，运送书籍，流亡辗转，暂落足于重庆两路口金城别墅六号。直到抗战胜利，复返回上海。

战争对中国分会的组织机构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抗战做准备，开始延揽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进入政府工作。30年代中期及抗战爆发后，更有大批学者、专家、实业家被延揽参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原本汇聚了一批教育、经济、财政、外交等领域的专家，此时期亦有不少会员及学会领导人员进入政府，其中尤以在外交领域为政府服务者居多。如前所述，1936年，何廉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胡适则于1937年被派往美国从事国民外交，次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中国分会执行干事刘驭万，则于1937年年初进入铁道部，此后先后在交通部、经济部物质局等地任职，抗战胜利后，一直担任驻外使节。^② 事实上，刘驭万之所以参加政府工作，很大原因也是为了维持个人生计。当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经济异常困难，执行干事常数月无薪可领，生活十分窘迫。1937年刘驭万进入铁道部工作后，曾致函胡适，请求辞去执行干事之职，但在徐新六、李干、沈昆三等人的勉励下决定留任，此后他采取两边兼职的办法，设法维持了学会的运转。有关学会的财政状况，下文仍将提及。总之，战时由于中国分会财政困窘，各负责人事务繁忙，执行委员会委员散居于重庆、昆明、桂林、香

① Liu Yu-wan to E. C. Carter, May 3, 1938.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档案号：E0146 - 001。

② 1946年起，刘驭万先后担任驻汉城总领事、驻韩国外交特派员、联合国驻韩委员会代表等职，此后一直任职于外交界。继刘驭万之后担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干事的刘裕棠（1947至1949年间任此职）1949年去台湾后亦从事外交工作。

港、美国等地，这些因素进一步影响了分会的工作。1940年，胡适因长期驻外而辞去中国分会会长一职。蒋梦麟接任，以为胡适“守此婴孩”。早在余日章等筹备参加第一届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时，蒋梦麟即曾列名筹备委员。但十余年后他之接任中国分会会长，似乎并非出于情愿。他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刘君劝弟为中国分会会长，以为兄守此婴孩。弟允之。弟对此本无兴趣，历年来兄知之，所以允会长，不得已也。”^①抗战期间，中国分会执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及其变动情况详见下表1：

表1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成员名录（1937~1946）

年份	执行委员会委员	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7	胡适、徐新六、陈光甫、张伯苓、刘鸿生、刘大钧、何廉、刘湛恩、吴贻芳、陶孟和、蒋梦麟、梅贻琦、黎照寰、陈达、刘驭万	胡适(委员长)、徐新六(副委员长)、刘鸿生(司库)、刘驭万(执行干事)、何廉(研究干事)、陶履恭、刘大钧
1940	蒋梦麟、陈光甫、张伯苓、刘驭万、刘大钧、吴贻芳、陶孟和、梅贻琦、刘鸿生、钱永铭、周鲠生、陈达、钱端升、张君勱、甘介侯	蒋梦麟(委员长)、陈光甫(副委员长)、刘鸿生(司库)、刘驭万(执行干事)、陈达(研究干事)、梅贻琦、钱永铭
1944	陈光甫、蒋梦麟、张伯苓、刘大钧、刘驭万、吴贻芳、梅贻琦、陶孟和、蒋廷黻、何廉、胡适、陈达、王云五、钱端升、周鲠生	蒋梦麟(委员长)、陈光甫(副委员长)、何廉(司库)、陈达(研究主任)、刘驭万(主任干事)、梅贻琦(常务委员)、蒋廷黻(常务委员)
1946	吴贻芳、王云五、梅贻琦、傅斯年、周炳琳、张伯苓、张君勱、潘光旦	胡适(委员长)、陈光甫(副委员长)、刘世云(司库)、陶孟和(研究干事)、刘驭万(执行干事,在假)、刘裕棠(代理执行干事)、蒋廷黻、周鲠生

根据 Liu Yuwan to Hu Shih, Feb 15, 1937,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 档案号: E0275 - 007; Liu Yuwan to Hu Shih, Sep 11, 1941, Ibid.;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案, 册名: 《太平洋学会》, 档案号: 412/0030, 影像号: 11 - NAA - 02698; “Documents of the Official Letters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6”,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 档案号: E0475 - 001 整理。

抗战期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领导层——执行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屡经变动，常务委员中未曾更动者惟有执行干事刘驭万。尽管刘驭万的一些办事方式曾招致出席国际会议的中国代表，如张忠绂、颜惠庆等人的批评。

① 《蒋梦麟致胡适函》（1943年1月4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489~492页。刘君指刘驭万。

但总体而言，在战时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分会能够得以延续，直至抗战胜利，与刘驭万的尽力维持密不可分。一个事例是，1941年年底香港沦陷，中国分会在港办事处以及刘驭万个人家庭均蒙受了巨大损失。抵达重庆后，刘驭万致函在美国的胡适，谈及对于会务的打算：“如今能够为中国分会做的事很少。由于通讯缺乏，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络几不可能。不过，我正着手在陪都建立一个办事处空架，仅为维系太平洋国际学会运动的延续性，以便战争结束后，我们的机构能再次运转起来，担负应有的职责。同时，只要机会许可，我们就东做一点西做一点。今后我不再支薪，反正也无钱可支。将近一年以来我没领到过薪水，我打算在别处找工作以养活自己和家人。”^①抗战期间，主要由于刘驭万、胡适，以及中国分会的其他委员的坚持，中国分会才能够存续下来，甚至蹒跚前行。

2. 中国分会的财政状况

作为一个民间组织，经费支绌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困难之一，且相伴其历史之始终。抗战的爆发更加重了其财政上的困境。此处有必要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财政状况做一下简要介绍。

中国分会的章程对于经费问题的规定是：“（一）本会经费由执行委员共同负责筹画。（二）本会经费年度以国历年初为开始，由主任干事提出预算，经执行委员会核准后公布。”^②其唯一一项经常性收入是会员每年缴纳的会费，根据会章，“本会个人会员每人每年须纳会费国币十元，于每年之一月分交纳（Pacific Affairs 之报费在内）”。^③中国分会虽每年经手大量研究经费，但该项经费系专款专用，并不能视为分会收入。

除去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每二或三年一度的会议所需费用外，中国分会每年的经常性支出主要包括下列几项：（1）事务所的房租。以1934年为例，该年分会设于基督教青年会上海八仙桥会所的事务所房租为1200元。^④（2）执行干事及其他干事的工资。（3）其他日常开销，如通讯费、印刷费等。（4）每年向太平洋理事会缴纳的会费（contribution）。关于1933年前中国及其他各国分会所承担会费情况详见下表2。

① Liu Yuwan to Hu Shih, March 13, 1942. 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适档案，档案号：E0275-007.

②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附录三”，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231~232页。

③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章程》，“附录三”，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231~232页。

④ 赵大瀛：《民国二十三年本会全年收支报告》，《上海青年》“民国二十三年度报告专号”（1935年3月6日）。

表 2 1925 ~ 1932 年太平洋理事会所收到各国分会会费及 1933 年会费预算表*

单位：美元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预算)
澳大利亚					723.00	600.00	415.00	400.00	600.00
加拿大					4950.00	5000.00	7990.00	4777.75	7500.00
中国				1000.00		1695.57	1463.41	1202.20	2000.00
英国					4820.00	4830.00	4863.13	3550.00	5000.00
夏威夷	34010.00	13655.00	20025.00	13200.00	20000.00	10000.00	10000.00	5525.00	10000.00
日本					10000.00	4915.00	4887.50	2500.00	5000.00
新西兰					482.00	483.00	500.00	42.12 ^①	500.00
菲律宾								500.00	500.00
美国(本土)	16417.86	20100.00	57000.00	55275.00	76800.00	49525.00	45000.00	22000.00	54540.00

* 根据“Statement showing the Receipts and Disbursement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for the Years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and 1932; Compared with the Budget for 1933 Receipts”一表, 见于“*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Financial Reports 1931 - 19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藏胡适档案, 档名: “Document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 1933”, 档案号: E0422 - 001。①原文如此。

需要指出的是, 按照表 2 所载 1933 年预算, 中国分会每年应向总会缴纳会费为 2000 美元, 但根据实际情况来看, 历年中国分会关于此项的预算为 1500 美元。

至于筹备及出席每二或三年一度的国际会议, 则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每次会议之前, 中国分会即需要在国内召集筹备会议, 与各会员及总会进行联络, 刊印论文和资料论文等; 而派代表团出国参加国际会议, 更需要筹备巨额旅费。以第一次会议为例, 11 名代表前往檀香山, 仅路费一项即预计需 7200 美元左右; 而自 1933 年起, 历次会议都在北美举行, 所需旅费金额更大。这对于一个缺乏经费来源的民间机构而言, 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为此, 中国分会不得不于每次会议之前向各界募集。在此方面, 对于中国分会来说略为有利的一个条件是, 它在酝酿之初与上海各公团建立了一定联系; 成立后, 一直有上海银行界、实业界精英担任司库及其他执行委员。因此, 中国会员出席第一、第二届会议的经费主要来自上海各公团、银行、商界, 以及个人的捐助。第三届会议时, 因东北问题是会议的主要议题, 张学良向中国分会提供了资助。第四届会议在中国举行, 国民政府对此次会议给予了大力支持。第五届会议, 中国代表得到了周作民的金城银行和翁文灏所

在的国防设计委员会的赞助。第六届会议，中国代表从财政部募得一万元的补助。不过，无论来自社会团体、银行还是政府的赞助，都是临时性的，对中国分会而言，每次会议前仍得经历一个四处求款的过程；而另一方面，会前所募得旅费之结余又成为学会日常工作所仰仗的经费。“不过学会经济来源，素无基金，经常费用，除少数会员会费外，大部份皆系每届大会时捐募经费，以余款补充，五六年来皆沿用此办法。”^①

总的来看，中国分会一直处于经费支绌的状态。1931年前，分会甚至没有会所，亦无雇员，其工作“都是由一班热心的人自动尽义务办的”。1931年后，财政状况有所改观，但并未有根本的缓解。抗战的爆发，使中国分会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1937年，中国分会未能向总会支付会费，至1938年夏，执行干事刘馥万已数月未领薪水。^②事实上，抗战期间，曾任总会研究干事的霍兰德在重庆常见到刘馥万，他发现刘同家人一直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霍兰德后来回忆说，中国分会能够在战争中坚持下来，甚至能够向总会缴纳会费，这不能不让他们这些总会的人感到惊异。同时，他们也隐约感到，中国分会大概是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赞助。^③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感觉的确是有道理的。

二 战时国民政府的介入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向以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自居。但因其所参加的国际会议所讨论的内容与中国对外关系密切相关。而以推动“国民外交”为旗帜，本含有充当本国政府外交政策奥援之意，因此事实上无法脱离与官方的联系。特别是1931年，中国分会筹办学会在华举行第四届会议时，外交部、教育部、铁道部、浙江省政府，甚至蒋介石本人都提供了大力协助。此后，国民政府亦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议讨论有所注意，例如，1933年该会第五届会议在加拿大举行时，吴铁城曾将会议的相关情报呈报蒋介石。^④1930年

① 《抄刘馥万君来函》（致翁文灏，1939年6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委员会档案，全宗名：军事委员会，全宗号：761，案卷号103。

② Liu Yu-wan to Hu Shih, July 25, 1938, 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第292～293页。

③ William L. Holland, “Recolle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The Memoirs of William L. Holland*, p. 117.

④ 见《一般资料——呈表汇集（三）》，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430-011，入藏登录号：002000001819A。

代上半期，中国分会为筹措出席国际会议的旅费，亦曾通过翁文灏等私人关系向政府求援。国民政府虽应其所求提供了一定赞助，但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行为。直到1935年的约塞米蒂会议，国民政府并未给予该组织以特别的重视，亦未直接介入中国分会的活动。

抗战全面爆发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事打响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战时中国分会为参加国际会议，必须经由官方的许可和帮助，方能获取代表出国所需之船票、飞机票及外汇；另一方面，国民政府为进行国际宣传，加强与美英的联络，争取外援，格外重视太平洋国际学会召集的国际会议，并介入中国分会的各项国际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的性质亦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将在职官员排除在外，而相关各国亦派出政府官员出席会议。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亲自过问中国代表的人选、提案及会议的讨论，并由外交部秘密宣传费下拨付中国代表出席经费，从而将中国分会纳入官方的指导之下。

对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这样一个致力发展民间外交及对中国各项问题进行研究的民间组织而言，向政府寻求赞助，乃是无奈之举；而政府的资助是一把双刃剑，虽使其国际活动得以继续，但损害了其作为民间组织的独立性和其学术活动的学术价值。有关这一问题，下文仍将述及。值得一提的是，国民政府所提供的赞助并未使中国分会的财政问题获得彻底解决。

第二节 1939年的弗吉尼亚海滩会议

1939年11月22日至12月2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七届会议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弗吉尼亚海滩（Virginia Beach）召开。会议举办地原定在加拿大的维多利亚（Victoria），但9月初，德国入侵波兰，欧洲战事爆发，会议随即决定改在美国举行。

一 最高当局的赞助

其时，担任中国分会会长的胡适已在美国担任驻美大使。为筹备出席事宜，刘驭万在重庆与经济部长翁文灏、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联络，二人提出了指导意见，对于代表人选，翁文灏认为，“以得力为最高前提，人数不宜太多”，他们一同拟定了代表名单。随后，刘驭万赴昆明，邀集当

地中国分会执行委员蒋梦麟、梅贻琦、陶孟和、刘大钧、陈达等开会，转达了翁、王的意见，讨论并通过了在重庆拟定的代表名单，并增加了候补人选。6月中旬，翁文灏呈请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行政院，对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代表给予资助，并将中国分会所拟《节略》及会议预算呈报中央。翁文灏的呈文提出：“查太平洋国际学会邀集有关各国热心人士聚集讨论，以前中国均经参加，于国际公论颇有裨益”，此次会议，“所需费用计共二万美金，拟恳由政府照拨俾资进行。”^①中国分会所呈《节略》称，中国代表此前已六度出席该学会会议，“凡属足以增高我国国际地位者，靡不尽力宣传”。此次会议中国分会仍拟派员出席，“值此抗战时期，对外宣传至为重要，中国分会出席大会会员自更需努力发扬我国之民族精神”。“惟本会经济来源素无基金，一切费用皆于每届大会时捐募，现以本届大会转瞬即届，中国分会应积极筹备出席事宜，特附具所需经费预算，敬请察核捐拨”。并提出包括代表旅费及用费、对总会应缴会费、论文印刷费及其他杂费等共约美金2万元的预算。^②之所以提出这样大数额的一笔预算，刘驭万对翁文灏解释说，“不过学会经济来源，素无基金，经常费用，除少数会员会费外，大部分皆于每届大会时捐募经费，以余款补充，五六年来皆沿用此办法，以维持会务”。“向委座要钱以驭看来，多是一要，少也是一要。要钱的机会不可不尽量利用。况且两万美金，实在也不算多。若待人数确定后，再为呈请拨发，恐嫌太迟矣！”^③蒋介石和行政院批准了翁文灏等的呈请，行政院发布训令：“应准参加”；“惟代表人数应减少为十人，半数由国内派出，半数就驻美国及加拿大人员内调派，经费总额减为美金一万五千元，由秘密宣传费内支拨”。^④

十名代表最终确定为颜惠庆、胡适、钱端升、周鲠生、陈光甫、李国钦、张彭春、陈其田、戴儒璜、温源宁。另由刘驭万担任秘书。此外，后来当会议召开时，在美国的冀朝鼎也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

① 行政院训令吕字7046号，1939年6月26日。见《各项国际团体》之八《太平洋国际学会》，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档案号：631.9/0003。

② 《节略》，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关于中国太平洋学会节略和该会第七届会议中国代表团之经费、人选》，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委员会档案，全宗号：761，案卷号：103。

③ 《抄刘驭万君来函》，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关于中国太平洋学会节略和该会第七届会议中国代表团之经费、人选》，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事委员会档案，全宗号：761，案卷号：103。

④ 行政院训令吕字7046号，1939年6月26日。见《各项国际团体》之八《太平洋国际学会》，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档案号：631.9/0003。

中国代表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有：

冀朝鼎：《中国战时经济的发展》

钱端升：《中国国家统一：政治与管理方面》

周鲠生和郭斌佳：《1931年以来的中日关系》

林维英：《外国在华商业与投资之未来》^①

中国代表团由颜惠庆率领。据说最初考虑代表团团长时，王世杰曾主张由蒋梦麟担任，蒋梦麟表示如没有人去，自己可以担任；若有适当人选，还是别人去较妥。刘驭万、王世杰随后商定由颜惠庆担任团长。^② 颜氏恰值所主持的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工作告一段落，“很乐意接受此项任务，为国尽点绵薄之力”。^③

几位主要代表此行赴美，于出席会议之外，更负有重要的国民外交使命。钱端升、周鲠生出发前赶赴重庆，受到蒋介石接见，蒋介石叮嘱他们留美半年，“相机协助外交活动”。^④ 二人在美从事国民外交活动的目标是，中央希美方予我三种助力：第一，望美劝英法不与日妥协；第二，借款；第三，禁运。^⑤

颜惠庆抵达美国后即有传言称他将接任驻美大使。事实上，颜惠庆在其回忆录中提到，他抵达美国之初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担任外交部长。他猜想蒋氏或许打算对政府人事作些调整；或许想让他乘访美之机向美国政府争取援助。但颜氏不愿接受此职，故意拖延未作答复。^⑥ 不过会议结束后颜

① Ch'ao-ting Chi, *War-Tim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9).

Chien Tuan-sheng, *China's National Unification: Some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Aspects* (Kowloon, Hong Kong: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9).

S. R. Chow and P. C. Kuo, *China's Relations with Japan since 1931* (Kowloon, Hong Kong: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9).

W. Y. Lin, *The Future of Foreign Business and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Kowloon, Hong Kong: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9).

② 《蒋梦麟致胡适函》（1943年1月4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491页。

③ 《颜惠庆自传》，第304页。

④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2册，1939年10月1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第160页。

⑤ 《钱端升致王世杰函》（1940年1月8日）。任骏选辑《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王世杰函》（1939年4月~1944年5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

⑥ 《颜惠庆自传》，第312~313页。

惠庆电复蒋介石，告知自己将留在美国直到次年春天以后，并要求拨给宣传经费。蒋氏应允，支持宣传工作。^①

二 欧战的影响

回过头来再看颜惠庆赴美旅途中的经历。颜氏等乘船由香港出发，取道欧洲前往北美，途中遭遇欧战爆发，不得不走走停停，不久后，他们接到学会总干事卡特的通知：会议改在美国举行。欧战给中国代表带来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他们从香港开出的英镑信用证因英镑对美元大幅贬值而损失惨重。^②途中的另一件事也值得一记，颜惠庆刚抵达印度，即接到卡特的电报，要他去拜访尼赫鲁（Jawaharal Nehru）。卡特一战前曾担任印度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对印度十分同情和关注；鉴于中印两国缺乏相互了解，他极力主张两国接近，据说，是他促成了1939年尼赫鲁访问中国。^③颜惠庆会见尼赫鲁时，尼赫鲁刚成功结束对战时中国的访问，回到印度。通过与尼赫鲁等人的交谈，颜惠庆感到，印度方面对于中国抗战持同情态度。

抵达美国后，中国代表于10月31日、11月19日两度召集会议，讨论本团议程、原则及分工等问题。周鲠生、钱端升还向颜惠庆等转述了重庆方面有关中日、中美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立场，即坚决抗战，不对日谋求和平，争取美援。根据颜惠庆的日记，“周和钱转告了继续抵抗的决定，还谈了军事实力”。^④而周鲠生则向王世杰汇报说：“到纽约之次日，即同端升、适之与颜骏人先生会谈，当时将介公意思向颜转述，颜似对中央趋向平和之印象较深，而对弟所述中央不在谋平和而在求美国援助之说稍惊诧，其与致卢函之意思有出入。弟同端升当时即为解释，原函系七月中所发，而现时之情势已有变动，着重之点容或有不同，而精神则一也。当日，弟并将自己在重庆各方所得到抗战坚定之印象及介公历次所发表之主张向胡、颜叙述，渠等亦甚欲知道国内近情，端升及弟所言自可供渠等参考。”^⑤

① 颜惠庆日记，1939年12月4日、5日。颜惠庆：《颜惠庆日记》第3卷，第250页。

② 《颜惠庆自传》，第306页。

③ William L. Holland, “Recolle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p. 99 - 100.

④ 颜惠庆日记，1939年10月31日。《颜惠庆日记》第3卷，第241页。

⑤ 《周鲠生致王世杰函》（1939年11月9日），《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王世杰函》。

11月22日，弗吉尼亚海滩会议开幕。此次会议与从前相比，缺少了数国代表。日本分会此次未参加会议，主要原因在于1938年太平洋学会的国际秘书处制定了一项名为“调查”（Inquiry）的研究计划，旨在对日本侵华之后果展开一系列调查研究，而这一研究项目旋即遭到日本分会的反对，日方最终决定推出自己的研究计划与之对抗，并对此次会议抱消极态度；加之后来欧洲战争开始，作为德国盟友的日本，亦不便参加会议。自此，日本分会在事实上退出了太平洋国际学会。欧洲国家分会则受到欧战的影响。荷兰代表因战时海上交通阻断未能参加会议；战时英、法两国分会有不少会员进入外交、情报、军队等部门服务，仅有几位观察员参加会议。出席此次会议的只有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的代表，其中以美国代表人数最多。钱端升因此向王世杰汇报说，“此次会议实无重要可言”。^① 由于未达到法定人数，本届会议以“研究会议”（study meeting）为名，以区别于通常的“大会”（conference）。

三 弗吉尼亚海滩会议有关中日战争的讨论

此次会议的总主题是“欧洲战争对远东的影响”。受欧洲战争爆发的影响，太平洋国际学会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欧洲作为关注点。^② 会议有四个圆桌会议，分别为：（1）日本的处境与政策；（2）中国的处境与政策；（3）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地位与政策；（4）调整的方法。会议的重心在于考察中日战争的现状，探讨其解决方式。

1. 日本的处境与政策

有关日本问题的圆桌会议虽然缺乏日本代表参加，但也有一些西方代表对日方观点做过认真研究，并在会上代为做详尽的申述和答辩。在颜惠庆看来，这些西方代表不无亲日倾向，“他们即使不完全赞同日本，至少也表达了对日本持谅解和袒护态度的第三者的意见”。^③ 中国代表则鉴于日方缺席会议，在讨论中日问题时，“出于礼貌，不得不控制自己的声调和有关内容，更多地讲述中国自身的情况，避免指责对方”。颜惠庆认为，既然中国

① 《钱端升致王世杰函》（1939年11月20日），《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王世杰函》。

② William L. Holland, “A Carrer with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The Memoirs of William L. Holland*, pp. 23–24.

③ 《颜惠庆自传》，第314页。

抗战的正义性已为各国与会代表所认同，因此没必要再把精力放在控诉日本上。^①

会议首先讨论了日本大陆政策的目的。对于这一问题，与会者的意见一致，即认为日本对华政策是以政治目的为主，经济目的次之。日本固然企图使中国成为其原料产地和产品消费地，但其更大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有效的霸权。在中国建立霸权后，再向亚洲各地扩展。在政治方面，日本的政策是要使中国成为弱国，但又不至于完全解体；在经济方面，其政策是要使中国成为其原料产地和商品消费地，决不允许中国在工业上与日本竞争。^②

中国代表强调经济问题亦是政治性的，并认为日本的政治、军事目的高于经济目的。中国代表提出，中国并不妨害日本的合法权利。日本政府若放弃征服中国的政策，它要与中国进行保障其合法权利的谈判并不困难，中国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给予日本以通商的机会。^③

会议考察了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后所推行政策的成败。其结论是，日本并未取得利益和当地人民的好感，亦未能建立一种健全的政治基础，以为其“东亚新秩序”张本。

既然与会者均认为中日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而非经济问题，那么，如何解决此问题？有几位代表主张推翻日本的统治阶级，废除军人的特殊地位，然后设法满足日本若干的合理要求。

2. 中国的处境与政策

会议讨论了中国的战况、西部各省的工业发展、外债等问题。颜惠庆就对日作战期间和战争结束后中国的统一问题发表了演说。^④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的统一与强盛，关系到远东的和平与安定。各国代表在事实上均承认中国即将成为一个近代国家，不能再按照从前的眼光，将其视为依附于他国而不能自立。一些代表主张，中国对日战争结束后，各主要国家应制定一项国际合作计划，援助积弱的中国进行建设。同时，他们亦都认同，此种“国际援助”就其概念而言已不再如19世纪那样具有监督

① 《颜惠庆自传》，第314页。

② 见《本届太平洋学会全体代表大会讨论之中日问题》，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编译，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档案号：特23/3.6。本文系根据大会秘书处的会议记录编译。

③ 颜惠庆日记，1939年11月22日，《颜惠庆日记》第3卷，第247页；《本届太平洋学会全体代表大会讨论之中日问题》。

④ 颜惠庆日记，1939年11月24日。同上书，第248页。

和控制的意味，不能以损害中国权利为代价。

关于中日问题的讨论，钱端升向王世杰汇报说，西方代表，特别是美国代表，大多对华表示同情及赞助，但此次会议只不过是交换意见的机会，并无具体之决议。^①

3. 西方各国在远东的地位与政策

通过前两个圆桌会议的讨论，会议还得出一个结论，即：在战争中，中、日任何一方皆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日本既不能切实巩固其在占领区之地位；中国亦无将日军逐出国土的能力。因此当前的形势已呈持久对峙、胜负难分的胶着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便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会者都认为，从目前英国自身的处境来看，它不会在远东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英、法都尽可能回避战争的风险。至于英帝国之各自治领，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在远东政策上，其主张又与英国有所不同。有英国代表建议，在远东问题上，英、法两国应给美国开一张空白支票，任其填写，即：让美国在下列三种政策中择定一项，英法则愿追随美国。三个政策是：一、从远东撤退；二、援助中国；三、斡旋一个中日妥协的和平。这就意味着完全推翻《九国公约》的原则，或对其进行根本的修正。不过，与会者都明了，除非美国首先表明支持某项政策的决心，否则英法决不会冒险去追随。而与会者大多认为，美国不可能表明此种决心。

其一，美国对日政策是会议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美国的远东政策深受美国民意之影响。会议对美国的民意进行了分析，其中提到的一点是：95%的美国人赞成用战争以外的任何方法援助中国；但同时也有95%美国人不赞成采取足以招致战争的政策。

会议又评估了西方各国若采取措施以促使中日结束战争，各项措施将产生的后果。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推翻当今的日本政府以铲除其侵略政策之根源的做法不会产生实际效果。因为在日本，无法靠改变政府以改变政策。

其二，关于美国对日实行禁运问题。一些代表认为，假若禁运实现，会导致如下可能后果：首先，日本对华宣战，在海上截夺别国运赴中国的物资。其次，日本或者进攻荷属东印度，或者倒入苏俄的怀抱，不过很多代表对这后一种假定提出了质疑。再次，美国的禁运虽与国联的经济制裁不同，

^① 《周鲠生致王世杰函》（1939年11月24日、12月13日），《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王世杰函》。

但也含有经济制裁的性质，或许其施行亦将付出战争的代价。

对日禁运问题是中国代表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周鲠生向王世杰报告说，美国代表极端同情中国，但不愿美国卷入战争漩涡，因此对禁运问题表现得很踌躇。他还分析了美国国内，包括政界、学界，对于中日战争及禁运问题所持观点的差异：“从各方面观察，美国现在对于中日问题之主张可分为下之数派：（一）白宫国务院及一派国际主义者或特别对华同情者，倾向于商约失效后由国会实行通过 Embargo（注：禁运）案；（二）折衷派要避免引起美日战争，主张不由国会通过 Embargo，而另用法律以外之方法实行对日排货或禁运，如所谓‘Moral Embargo’或保护‘National Resources’之名义；（三）孤立派主张美国从远东政治上退出，专顾经济商业利益，速与日本订立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之商约，而不管中日之争执。耶鲁大学教授 Griswold 即代表此派……如 Griswold 之说虽属极端，不见得为多数人所赞同，但（二）派意见则似很有势力，因为美国人一般惧战心理甚强，总怕因采行经济制裁而引起对日战祸。太平洋学会开会时，会中美国代表改变表现此心理，而主席之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 Jessup 氏有该大学校长候补人之呼声者，尤为此派之代表。上星期六在‘外交政策协会’演说席上（适之为演说之主客）Jessup 即公然断言，美国不能接受使美国卷入战争之义务，故不能采行对日 Embargo 案，其实 Jessup 亦对中国表同情而于我们表示友谊之人，当时在座之中国人及对中国事热心之美国人士均闻其说而大失望，然亦无可如何，美国怕战心理之事实实不可否认也。”^① Jessup，即杰塞普（Philip C. Jessup），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时任美国分会会长，后曾担任学会会长。

其三，关于苏联在解决中日冲突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一些中国代表与美国代表发生了争论。一些美国代表提出，苏联的援助对中国的未来十分重要。但一些中国代表鉴于近来因苏联入侵芬兰，而在美国舆论界引起反苏情绪，因而有意淡化苏联援助的作用，而前述美国代表则对中国代表的此种表示不以为然。^②

4. 远东调整的可能性

会议还探讨了远东争端持久和平解决的可能性问题。

^① 《周鲠生致王世杰函》（1939年12月13日），《周鲠生等为汇报美国外交走向事致王世杰函》。

^② 《太平洋学会我国出席代表刘驭万报告书》，《本届太平洋学会全体代表大会讨论之中日问题》，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

会议首先考察了中日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提条件。对此问题，分析了中日战争的各种可能结果（包括日本能够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中国能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中日两国都不能得到完全胜利而由他国出面干涉）与实现和平解决之间的关系。

其次，会议讨论了以何种方法使中日两国能够进行谈判。中国代表提出，美国若能利用 1940 年 1 月《日美通商航海条约》宣告结束之机，向日本施加有力的禁运压力，即可以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上述结果，这种意见亦得到其他国家代表的赞同。对于美国舆论是否愿意拥护对日禁运问题，各代表的看法不一致。至于禁运是否会引发战争这个问题，美国代表之间，意见亦互相歧异，但大多数人认为美国如实行禁运，则日本不得不同意谈判。尽管有一些代表认为美国就其自身利益和道义而言，都应援助中国，但没有人相信美国会因此而同日本作战。也有人提出，中日两国照这样打下去，到双方都精疲力竭之时，或许也有和平谈判的可能。但中国代表提出，中国决不能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与会者均认为中国决不能自动地单独造成和平谈判的先决条件，换言之，日本及第三国实居于和平谈判的主动地位。

关于促使谈判获得最大成功的方法，与会者均认为是以召集多边会议的形式。至于多边会议的构成则有不同意见，有人主张召集一个以苏联为首的多边会议，或由苏联联合德国召集；但也有人提出，由美、英、法三国召集会议的可能性更大，许多代表都认为，唯有后一种形式方可实现长期和平。

会议还衡量了远东问题的局部解决和世界大战总体解决之间的关系。有人主张欧洲战争之解决应先于中日战争，也有人主张远东问题之解决应先于欧洲问题。此问题又涉及中日战争与欧洲战争是否同属于一场世界大战问题。与会者认为假如能有一个适用于全世界的总体解决，自然再好不过，但远东问题有其独特之处，须作局部的解决。

再次，关于持久和平解决的要素，即谈判中应注意的要素问题，与会者大都认为任何和平解决的方法皆须同时顾及中日两国的未来。也有个别西方代表提及，中日实现和平后，两国的发展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的可能性。与会者认为，和平解决之实现，必须为日本将来的经济命运做一个安排。至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很多代表认为，其在各方面均有很大的发展机会。会议也讨论了对华投资问题。会议亦明确以下原则：解决中日纠纷过

程中，各国不能因袭以往向中国勒索利益的故伎；保障日本及其他各国对华商业投资；若大部分政治及财政控制权掌握在中方手中，则中日两国依照特别规定共同经营实业即有可能；西方各国应准备取消各项对华不平等条约。

最后，关于远东持久和平解决的条约机制问题。对此问题，与会者对华盛顿会议的弊端进行了剖析。至于如何设立机构以实行条约规定，有代表提出，国联已不再是一个可靠的机制了，也有人提出，华盛顿条约的弱点即在于没有执行机构，因而，有人主张订立有关太平洋问题的新条约时，除规定各国互相咨询之外，应设立一个永久的秘书处，专负责经济及其他技术性的事务。^①

三 会议在中国引发的反响

当会议结束后，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援引12月5日美国合众社一则有关会议的新闻称：“关于满洲，中国代表团代表声明，国联会议曾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国于满洲建议，仍可接受作为交涉之基础。”“中国代表坚持任何解决，必须在《九国公约》范围内，且必须符合中国领土之完整，或至少长城以南十八省之领土完整。”此消息迅即在中国国内引发了争议。

1940年1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君勱等，就报道所载中国代表有关东北问题的声明，向外交部提出质询。同时，因中国代表中颜惠庆、钱端升、周鯁生、张彭春、陈光甫等本为参政员，复向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询问是否属实，并转请议长向钱、周二人询问。二人自美国复电称：“并无此事，余容面谈。”但张君勱等复以中国代表及国民政府对此报道并未予以更正，“未免是非混淆，启人忧疑”为由，呈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呼吁予以驳斥，称“同人等以兹事体大，所关非细，拟请我政府除迅电该代表团速向该社该报要求更正外，并由我政府负责人利用发言机会明白声述否认，此外，或在报纸着论驳斥或借广播纠正闻听，庶国土主权不致因言语误

^① 《太平洋学会第四次会议讨论结束时杰苏普博士之结论报告》，《本届太平洋学会全体代表大会讨论之中日问题》；Kate L. Mitchell and W. L. Holland eds.,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Proceedings of the Study Meeting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Virginia Beach, Virginia, November 18 - December 2, 1939*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pp. 106 - 137.

传而蒙重大之损失为幸也”。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密函中央宣传部查核。^①这个消息引起了各方的注意与愤慨。例如，辽吉黑热旅渝同乡会上呈国民党中央，请求纠正中国代表措辞之失当。2月，时已改任宣传部长的王世杰回复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称，接到钱端升回复的私函，“据彼所知，太平洋学会报告中所云《九国公约》至少应适用于十八行省一语，系太平洋学会开会时主席美国代表 Professor Jessup 个人之意见。中国代表无作此种表示者，后中国代表并已向该会声明否认，并请其将报告中主席个人之意见删除云云。查此项言论既非中国代表所发，且已经中国代表向该会纠正，则中国代表团初无若何不合之处，应相应函复，即希查照转知为荷！”^② 函中“系太平洋学会开会时主席美国代表 Professor Jessup 个人之意见”一语，指的是美国合众社的报道，出自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杰塞普对圆桌会议所做的综述。中国代表直到会议结束后才看到此综述。颜惠庆、刘驭万致函学会总干事卡特等人，要求对会议报告进行修正。同时，中国分会将从大会秘书处取得的会议记录，交给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进行编译，送交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等处。2月下旬，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认为，“查此事社会似已冷淡，似可不再报究”。3月，颜惠庆收到卡特电话，刘驭万收到卡特复函，应允将来会议报告正式出版时进行更正。直到4月间，此事方告平息。

但这场风波仍对中国分会及与会代表造成了一定影响。一年后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谈到颜惠庆此次会议后的遭遇，“会后因某种误会，渝中对颜空气颇恶劣，参政会中且有责问。故俊人先生返国后，径留香港，既不敢回沪，又不愿飞渝，终于沦陷敌手，其境遇殊可怜”。^③ 当然，这只是蒋梦麟个人的认识。

至于颜惠庆本人，他在香港期间，开始撰写自传中有关弗吉尼亚海滩会议部分。在他的回忆中，他参加此次会议大体上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颜惠庆可谓久经沙场的外交界老手，参加过各种重大国际会议，然而，

① 《呼吁各方驳斥太平洋学会我代表团关于满洲声明之经过类别》，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种档案，档案号：特23/3.7。

② 《本届太平洋学会全体代表大会讨论之中日问题》。Philip C. Jessup，杰塞普，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时任美国分会主席，后曾担任学会主席。

③ 《蒋梦麟致胡适函》（1943年1月4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489~492页。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仍令其耳目一新：“我第一次出席这种非官方的会议。会议组织安排的周到顺畅，秘书处成员的精干练达，研究人员的认真精神及其所取得的学术性成果，以及会议程序的严格掌握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另一方面，他对这种非官方学术会议只注重陈述各种相互歧异的观点而不做结论的方式并不赞成，认为太过学究气，而缺乏实际效用：“的确，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有很多是太平洋问题各个领域的专家，从学术角度来看，讨论确实达到很高的水平。但是，他们不过是提出一些类似教条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对于复杂多变的外交谈判和处理尖锐的国际冲突并无实际意义。有时候，就某一问题进行讨论是为了得出结论，但往往由于争议太多，结果使人只见一棵棵‘树’，而很难发现‘森林’。”^②不过，总体而言，他认为太平洋国际学会有其价值：“太平洋国际学会所收集的关于太平洋问题的大量资料和所表述的观点，是极有价值的，该会对某些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解决方案。对于未来的世界政治家和外交家们来说，他们通过参加大会，不仅可以从讨论中获得有益于实际工作的启示，而且可以应用专家和研究工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以作施政和交涉的根据。”^③

第三节 1942年的蒙特朗布朗会议

一 太平洋战争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影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的参战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美国分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在当时的美国尚属少见的且已具声望的亚洲太平洋问题研究机构，太平洋国际学会成为美国政府及军事部门有关东亚问题的可靠知识来源之一，二者向学会订购了大量相关问题的出版物，特别是通俗出版物。同时，有不少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及工作人员加入政府或军事部门，其中一些人被派往中国等地从事外交、情报等方面的工作。还有很多会员参加了民间的援华工作，如学会总干事卡特担任美

① 《颜惠庆自传》，第313～314页。

② 《颜惠庆自传》，第314页。

③ 《颜惠庆自传》，第315页。

国联合援华会（United China Relief）的负责人之一，研究干事霍兰德也是该组织成员。二人战时曾数次访华，卡特因其援华活动获得了国民政府的授勋。原籍新西兰的霍兰德 1945 年年初入籍美国，随即被派往重庆担任美国战争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的负责人，抗战胜利后，他返回美国，接替其职位的是另一位学会会员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太平洋战争极大影响了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的面貌。第八届会议议定于 1942 年 12 月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朗布朗（Mont Tremblant）举行。此次会议是学会在珍珠港事件后所举行的第一次会议，其主题为“太平洋的战争与和平”，会议讨论的中心内容包括：太平洋战场的战略问题、战后处置日本问题，以及建立国际和平机构问题等。这次会议召开时，学会各成员国都已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会议对于出席者的身份不再限于非官方代表，而是汇聚了相关各国大批政府官员。事实上，其中不少人原本是学会会员，只不过因战争加入各自的政府或军队服务，成为高级幕僚。当然，这些人员仍是以私人身份出席蒙特朗布朗会议，但这仍或多或少使此次会议蒙上了一层官方外交的色彩。^①

二 《说帖——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团之指导方针》

珍珠港事变前后，中国分会也发生了若干变化。1940 年，蒋梦麟继胡适之后担任会长，次年年底，香港失陷，中国分会事务所辗转迁往重庆。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记述他接任会长后中国分会的一系列遭遇，“其后筹措经费，以战事关系，颇不易，且港币价格日高，万元之积不过二千，故屡向复初、雪艇、光甫、咏霓求恤。至香港沦陷，遣散人员，及以前遣运书籍及刘君家眷入渝，总费超出七万元。故复向庸之、子文乞钱”。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中国分会开始筹备参加学会第八届会议，蒋梦麟等将会议的消息报告给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对此次会议表现出空前的重视。太平洋战争打响后的两年间，中国的国际形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1942 年 1 月，中国与美、英、苏

^① “Preface”, in *War and Peace in the Pacific: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Eighth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on Wartime and Post-war Coope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Pacific and the Far East, Mont Tremblant, Quebec, December 4 - 14, 194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3), pp. v, vi.

等国一道签署了《联合国宣言》，其后，中国战区建立，美国加大对华经济、军事援助。1942年，盟军在第一次缅甸战役中失利，缅甸的失守使中国对外交通变得异常困难。1941年8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了《大西洋宪章》，次年双十节前后，美国与英国向中国表示愿意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特权，中国与美英两国展开签订平等新约的谈判。蒙特朗布朗会议举行之际，恰值中英、中美谈判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府对即将召集的这次会议非常关注，认为，“本年太平洋国际学会开会，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一次集会，故于中国关系特大”。^① 国民政府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了解美、英等盟国政策动向以及社会舆情，对外宣传中国的各项主张，包括对战后亚洲太平洋区域国际新秩序的看法，同时争取更多的国际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学会所举行的两次会议上，中国代表不再如从前那样只关注于本国问题，而更多参与亚太地区国际事务，如建立国际和平机构，处置日本、印度及东南亚殖民地独立等问题的讨论，这自然是受此时期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之影响，也与政府的参与有关。

出席1942年会议的中方代表团团长最初确定由蒋梦麟、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蒋廷黻三人之中选择其一，但三人皆因事不能成行，最终确定由施肇基担任。其余代表包括周鲠生、朱世明、方显廷、夏晋麟、徐淑希、李干、李国钦等，共计10人。中国代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包括胡适的《关于战后亚洲的两篇论文》、方显廷等的《中国经济重建问题》、周鲠生的《太平洋的永久秩序》。^②

国民政府特制定了《说帖》（《说帖——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团之指导方针》），以作为对中国代表的指示，蒋介石亲自对《说帖》做了最后

① 《说帖——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代表团之指导方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册名：《太平洋学会》，档案号：412/0030，影像号：11-NAA-02698；《各国政情（二）》（1935/12/28-1945/3/7），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典藏号：002-080107-00002-006，入藏登录号：002000001305A。

② Hu Shih, *Two Papers on Post-war Asia* (New York: China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2).

H. D. Fong, K. Y. Yin, and Tso-Fan Koh, *Problems of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New York: China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2).

S. R. Chow, *A Permanent Order for the Pacific* (New York: China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2).

主要依据 *War and Peace in the Pacific*, p. 143。

的修订。《说帖》一方面提出，“各国代表团中虽有不少在各国政府中居重要位置者，然在我方仍应谨守以非官方代表发言及不拘束政府之惯例”。同时又指出，“但为便利该团之工作起见，特列举指导原则数则于后，俾该代表团其他代表于会议中知所遵循”。^①对中国代表的各项指导原则包括如下方面：

一般原则：一、以联合国家全体签字之《大西洋宪章》各原则为依据；二、战后和平机构之建立应以现实观念为基础，并应着重于采取有效方法使国际机构能遵守法律、维持秩序；三、远东经济之重建应以美国租借协定之精神与原则为圭臬，中国欢迎私人投资，惟此种投资应以与中国合作为基础而谋实业之发展；四、中国不欲在亚洲谋求领导地位。

在各实际问题上：一、对日问题解决之条件应包括：收复东三省（包括旅顺、大连）及其他被占领土地，归还台湾、琉球及澎湖列岛，朝鲜独立，裁减军备并筹划监督其实施，惩处在南京及中国各地残暴作恶之日本人，赔偿对中国人财产所加之损伤，发还被没收及运至日本或他处之财产等；二、关于香港问题，“我方以避免提及为宜，如有他国代表团提出而向我征询意见时，只说中国自然欢迎盟友以友好姿态归还”；三、对于东南亚及西南太平洋各殖民地与委任统治地问题，应避免主动提及；四、关于越南问题，应唤起会中注意，越南乃法国用武力与诈取手段所侵占之中国领土，我方主张应予越南以独立自由；五、对于中美关系，提出作坦白之讨论，可指出美国对华人入境之种种限制乃破坏《大西洋宪章》之基本原则；六、关于中英关系，“如系由英国以外之其他代表团提出，宜采缄默态度，但可作一普通之声明，谓两国邦交并不十分愉快，须加以改善，让英方先说明其理由；如系英方先提出此问题，则将我方意见为坦白与客观之说明，但勿表现苛责或故作讥刺之言词，可郑重声明，此种不愉快之状况，乃由于许多意外事故相积之结果……至于印度问题，以不涉及细节为上策……该代表团可郑重声明中国极愿与英国不仅于战争中合作，并愿从事战后复兴工作之合作，但在英国未先建议一定解决办法以消除各种困难以前，不必提出具体方案”；七、关于中苏关系，可声称一向友善。

^①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册名：《太平洋学会》，档案号：412/0030，影像号：11-NAA-02698；《各国国情（二）》（1935/12/28-1945/3/7），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典藏号：002-080107-00002-006，入藏登录号：002000001305A。

关于中国之几个特殊问题：一、政府民主化在逐渐推进中；二、中共问题，并不如外界所传那样严重，国民政府对中共采取宽容政策，目的在维持统一，不破坏国家之军令与政令；三、物价飞涨，系由内外两方面因素造成，目下正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应对；四、中国工业合作协会问题，工合已有一定成就，令人遗憾的是该会曾带上政治色彩，今后应加避免。

《说帖》反映出国民政府希望会议着重讨论的各项问题（如收回中国被占领土及各项主权问题、战后处置日本问题、建立国际机构问题、华侨待遇问题等），以及不愿会议涉及的问题（如以香港问题为中心的中英关系、包括国共关系在内的各项中国内政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民政府一方面希望中国代表能紧密配合政府外交，扩大对外宣传；另一方面，又警惕其言论干扰进行中的官方外交谈判。

三 会议之经过

12月4日，太平洋学会第八届会议在蒙特朗布朗开幕。各国分会，尤其是英、美两国均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英国代表团由曾任英属印度旁遮普邦、联合省总督的海雷勋爵（Lord Hailey）担任团长；美国代表团由太平洋学会会长杰塞普为首，其成员还包括总统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国务院特别顾问霍恩贝克（Stanley Hornbeck）、曾任亚洲舰队司令的退休海军上将颜露尔（Harry E. Yarnell）等。出席会议的还有来自中国、自由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菲律宾、印度等国的代表团，自由泰和朝鲜也各有一名代表参加。其中，印度代表团是首次出席会议，不过其成员中并没有国大党方面的人员；朝鲜代表则是自1927年后首次独立出席学会会议。与以往有所不同，此次各国代表几乎都是乘飞机前往，这固然与战时的交通状况有关，但再次从侧面反映出各国政府对会议的重视。由于此次会议讨论涉及许多关键问题，根据与会的加拿大外交次长建议，会议决定采取秘密的形式，不接受记者采访，也不再像往届那样每日对外发布公报，各国代表之发言亦不得对外发布。不过，施肇基等通过电报形式将会议情形详细报告于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宋子文又呈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蒋介石又令将各报告转送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王世杰参考。

开幕式上，由各国代表团团长致辞，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中、英两国代表的发言。施肇基演讲《中国对于战后世界的见解》。^①他遵照前述《说帖》的指示，首先陈述中国对撤废加于其主权上的一切限制，收回被武力及武力威吓所掠夺的领土之决心。继而表明中国希望建立一个有充分权力的国际机构，以维持世界和平与正义。他还暗示中国欢迎外国投资与援助，惟此种投资与援助不能附有政治条件。他呼吁改善中国人在外国居住、经商、旅行所受之待遇。对于施肇基所提出的中国的各项要求，与会者大多认为正当合理，应予以同情之赞助。英国的海雷勋爵发言强调，纷争地区的一切解决方案，应以集体安全与经济及社会之进步为主要依据，而以中间权力为监督机关。关于中国问题，他提出日本应退出东三省及朝鲜，但仍可以在该地从事实业活动。对于香港之前途，他提出不能仅由中英双方依据条约权利磋商决定，而应由中国与太平洋区域国家为大局安全及转运贸易之继续起见，而求一般之解决。关于东南亚之中国移民问题，需要中间权力之咨商与指导。他还提出，中国应当在越南、朝鲜边境安全问题，以及上海过境之便利问题上，有所贡献。对于战后日本之处置问题，他提出应准许日本在中国东北及朝鲜继续从事经济活动，但应将日本的部分工业设备转让给邻国，特别是中国。他主张帮助日本之出口工业，并按照《大西洋宪章》及《租借协议》的精神，准许其在世界市场上自由贸易。他还主张设置太平洋区域安全委员会，由各主要主权国家之代表组织。与会代表对于海雷勋爵的演说，反应比较冷淡，一部分美国代表怀疑英国试图拖累美国以助其保存大英帝国。^②

随后举行的圆桌会议分为两种形式，首先举行的四个圆桌会议，主要讨论联合国合作问题，其中又涉及建立太平洋区域集体安全机制，在收复地区建立民选政府等问题；其后举行的圆桌会议，按照国别划分为中国、日本、印度、东南亚、其他联合国五组。

1. 联合国合作问题

有关联合国合作问题的圆桌会议中的一个总体趋向是，与会代表更乐意讨论政治战略问题，而非军事战略问题。美国代表、太平洋学会会长杰塞

^① Sao-Ke Alfred Sze, "A Chinese View of China's Position in the Post-war World", in *War and Peace in the Pacific*, pp. 16 - 19.

^② 《施肇基博士十二月十二日由加拿大致宋部长电译文（第一号）》，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 - 060200 - 0006。

普曾提出一个请罗斯福总统召集联合国开会，讨论战时及战后各种问题的建议。施肇基等对此建议很感兴趣，因为这可以增加中国参与确定相关军事及战后政策之磋商的机会。但英国代表及部分美国代表对此建议反应冷淡。^①

2. 中国战场问题

在中国问题圆桌会议上，中方出席代表为夏晋麟、方显廷、徐淑希，朱世明与李干也参加了部分讨论。会上首先讨论了战略问题。中国代表敦促尽快重视亚洲战场，强调中国之潜力可成为打败日本之一大要素。美国代表赞成以中国作为打败日本之最好根据地。而围绕克复缅甸问题，主要以中、美代表为一方，以英、加代表为另一方，产生了意见分歧。英国代表等认为，联合国为维持南太平洋战线，已付出巨大牺牲，因此不能为缅甸战场调配物资、人力及船只。加拿大少将欧蓝姆（Major General V. W. Odium）引述专家的观点，认为克复缅甸所需时间，连同其筹备时间，或需二三年之久。美国退休海军上将颜露尔和中国代表，都一再强调缅甸战争之重要，其理由为：缅甸是反攻日本之最好陆地根据地，此外，鉴于苏联目前仍守中立，而由印度向中国空运物资十分困难。中国代表讲述了中国因被日军完全封锁，而导致的国内经济危险局面。圆桌会议的讨论结果，大致认为，亟应设法攻克缅甸，使物资顺利运输到中国。一些代表认为，联合国的高层战略会议，缺乏中国的参与，应设法予以补救。新西兰驻美外交代表纳什（Walter Nash，1930年代曾任新西兰财政部长，1950年代曾任总理）提议，最高军事会议（Supreme War Council）中，应有英国、美国、中国、苏联代表出席。在英国代表怀德与数名美国代表发起的美、英、中、印四国主要代表的非正式聚会中，有人建议将上述建议以私人名义非正式地提交于罗斯福及丘吉尔，但最终并无结论。据施肇基的观察，讨论结束之际，欧蓝姆及一些英国代表，对于中国战场地位的看法似乎有所转变。^②

3. 关于战后香港、台湾问题

会议讨论涉及香港、台湾问题。这也是中方非常关注的问题。在此问题

① 《施肇基博士致宋部长十二月十九日电译文》（之一），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6。

② 《施肇基博士十二月十二日由加拿大拟致宋部长电译文（第二号）》、《施肇基博士致宋部长十二月十九日电译文》，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6。

上，中、英代表的意见针锋相对。会议开始之际，施肇基等即指出，台湾完全为中国领土，香港并非为适宜之安全基地。在12日发给宋子文的电文中，施肇基报告说，英国代表目下似愿意考虑战后交还香港问题，中国代表预备在此问题上提出，无条件收回香港后，如各国在一个世界自由港制度之下设立自由港，则香港亦可成为自由港。宋子文立即回电训示：“诸君在讨论时口气不可过于直截详尽，因形式上诸君为学术团体，非政府代表也，且预备建议关于香港亦可为自由港一节，在政府尚无明白训示以前应慎重发言。”^①时值中英两国签订新约的谈判正围绕九龙问题而争执不下，宋子文、蒋介石等对施肇基所报告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上英国代表的言论十分关注。14日宋子文面见蒋介石汇报与英美交涉和太平洋学会开会情形，蒋介石在当日的日记中记录：香港问题英国表示有放弃之可能。

一些代表，特别是英国代表提出，战后将香港及台湾设为安全基地问题，亦有人提出将香港开放为自由港问题。中国代表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是：中国各领土之归还应为无条件的，并且中方不愿单独讨论以任何中国领土，作为安全基地，或自由港问题，并且在此事未提出作一般讨论之前，亦不愿意首先提及。施肇基及美前海军上将颜露尔都提出，香港地面狭小，人口稠密，又为华南门户重镇，实不宜作为安全基地。中国代表复向主张以香港为安全基地的代表质询：设立此安全基地，是为防御哪个国家？^②虽然有代表答复称为防日本，但施肇基等仍感觉若干西方代表，尤其是英国代表之作此提议，反映出他们对于中国未来之强盛心存顾忌。^③

此次会议并未讨论国共关系和工合问题。会议开始之时，施肇基等即暗示，对于中国问题，只愿讨论中国的外交关系，不愿涉及中国内政问题。

4. 战后处置日本问题

会议讨论了战后处置日本问题。多数代表认为，对于日本，应首先猛予击败，再由盟军短期占领。应解除日本军备，使其交出海军，解散其陆军，禁止其军火工业、兵工厂、海军船坞以及军用飞机。同时，又认为对日实行

① 《施肇基博士十二月十二日由加拿大致宋部长电译文（第二号）》，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6。

② 《施肇基博士十二月十九日来电译文》（之三），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6。

③ 《施肇基博士致宋部长十二月二十二日来电》，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6。

长期控制，不切实际。关于日本所占殖民地、东三省、委任统治地等的处置问题：东三省、台湾应归还中国；委任统治地应交于美国；朝鲜应在国际保障之下，予以独立，倘有必要，应予以协助。会议还主张实行长期休战，以使日本自由主义人士，得到机会以获取政权，并担任将来和会的磋商工作，藉可使日本参加《大西洋宪章》下之国际社会。鉴于日本将来势必与整个世界的繁荣和经济安全相关，因此认为，应给予日本维持稳定与发展经济及商业之机会。^①

圆桌会议还讨论了印度问题、东南亚问题，这又涉及殖民地国家战后独立问题。对于印度问题，会议公认印度在战略上之重要地位。但对于印度独立问题，主张应逐步改进，反对在战时进行激烈变更。施肇基等表示，中国对印度全体国民表同情，并无党派或社会阶级之偏见，亦无意干预印度内政或英印关系。对东南亚问题，多数代表认为，各殖民国家，应在国际监督制度下，对各殖民地，予以逐步而完全之自治。此种国际监督机关，应立即设立。^② 此次会议对殖民地问题的讨论，特别是一些美国、加拿大代表对于西方在印度及东南亚所实行的殖民政策的批评，令英国、荷兰、法国三国代表大为不满。^③

5. 会议的八点共识

会议结束之际，综合圆桌会议中各方见解，形成八项建议，并提交大会讨论，包括：

- (1) 关于战后太平洋区域航空线路之管理政策，应立即加以研究。——无异议。
- (2) 英国代表应研究如何促其政府发表声明，以消除对于《大西洋宪章》适用于全世界问题之疑虑。——因英国代表反对，讨论无结果。
- (3) 中国参加作战工作应予扩大。——无异议。
- (4) 在美国、加拿大之日侨，应予以公平与人道之待。——无异议。
- (5) 对于以人种为理由之移民差别待遇，应采取一切合理步骤加以修

① 《施肇基博士十二月十九日来电译文》（之二），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6。

② 《施肇基博士致宋部长关于太平洋学会会议十二月十七日来电译文》、《施肇基博士十二月十九日来电译文》（之二），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6。

③ William L. Holland, "A Career with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 27.

正，以期促其改善或取消。——无异议。

(6) 在印度国家会议印度化以后，该会应考虑邀请联合国专家在过渡期内，以顾问资格襄助一切。——无异议。

(7) 对于圆桌会议中关于东南亚殖民地政策之各项建议，各代表应研究如何使其广为传布。——无异议。

(8) 对于美国充分参与集体安全制度问题，美国代表应将其重要性设法向美国人民作更有效之宣传。——无异议。^①

四 施肇基的感想

会议结束后，施肇基复向宋子文等汇报了他对此次大会的总体感想：

(一) 感觉若干代表，尤其英国代表对于将来强大之中国怀有疑虑。由其要求以香港及台湾作为安全基地可以见之。

(二) 均势说，即以势力均衡为主体之国策战后似将继续风行。

(三) 英国代表似倾向于主张战后立即恢复贸易，力谋获得美国之合作以维护其殖民地。

(四) 印度及印代表系属指定，不过傀儡而已。

(五) 英国及荷兰代表，准备最佳，本人兹益加相信，参加任何会议之前，有充分准备之必要，以期获得良好之结果。

(六) 本人参加国际会议，此为首次见英国代表团始终立于守势地位。

(七) 加、澳代表倾向于美国，似甚于其倾向于英国。

(八) 无人提出任何关于我国合作社或共产党问题，在会议之初，本人曾向一二代表暗示，对于中国情形，除有关国际方面者外，其他任何讨论，当非所愿。

(九) 中国代表团合作密切而优良。各代表承先生之明白指示，均能努力前进。^②

① 《施肇基博士致宋部长十二月二十一日来电译文》，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6。

② 《施肇基博士致宋部长十二月二十二日来电》，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6。

第四节 1945年弗吉尼亚温泉会议

1945年年初，欧洲战场、太平洋战场已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此时，太平洋国际学会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Hot Springs, Virginia）举行了第九届会议。本届会议的酝酿和筹备经历了一个较长阶段，在会议召开的前一年的1944年1月9日至16日，太平洋国际学会先在美国亚特兰大召集了一次太平洋理事会常会，讨论学会工作方针，并为即将举行的大会作筹划，特别是制定会议议程，邀请美、英、中、荷、法、菲、加、澳、新各分会各派五名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亦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

一 1944年年初的亚特兰大会议

早在第九届会议召开的两年之前，中国分会即开始着手准备工作，1943年1月，蒋梦麟致函胡适说，“弟本月内当赴渝与委员长及子文一商两年内预备办法，以便下届开会时应付，以免临时仓卒之苦”。^①

亚特兰大的理事会会议召集时，蒋梦麟、刘驭万均在邀请之列，但二人因经济及时间原因，皆无法出席。中国分会在渝执行委员会与中央宣传部会商，经由外交部、宣传部高级长官参加意见，决定电请施肇基率李干、夏晋麟、桂质廷前往出席。时恰值蒋廷黻因公赴美，分会亦邀其为代表。^② 分会拟定了《致施植之先生备忘录》，以作为中国代表在讨论抗战、中国经济、东南亚、对日处置、国际和平机构等问题时的参考。并将筹商经过及备忘录呈报宋子文，获得其同意。蒋梦麟复向蒋介石上签呈，并请求拨给美金五千元以作为施肇基等人赴会经费。蒋介石应允了其请求，并对前述《备忘录》做了修订。^③

亚特兰大的会议结束后，施肇基将会议情形择要报告给宋子文及中国分会。施肇基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一）关于美国的太平洋政策，美国代表表示，美国公众舆论，对于参加国际组织的态度有很大进展，不致再回到以前的孤立政策。但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参加程度，仍视战争发展情况，及本年总统及国会选举之结果而定。美国民众对华及对日政策，意见颇为分歧。美

① 《蒋梦麟致胡适函》（1943年1月4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489～492页。

② 后因蒋廷黻视察美国西部，未能出席，施肇基等于是邀请吴景超参加。

③ 《太平洋国际学会明年在美开理事会派施肇基参加拨美金五千元附备忘录》，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60200-0007。

国民心中，对华常存有如下疑问：“将来中国成为强国后，是否危险？”“中国战后能否和平统一？”“中国是否趋向民主政治？”施肇基认为，这些问题，将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之重要因素。与会美国代表都认为美国人民有打败日本之决心。但在制定下届大会议题时，美国代表杰塞普曾提议是否在议题中加入“对日议和之可能”一项。施肇基揣测杰塞普的用意，似乎是因其不满英国代表对日态度过于和缓而提出的。英代表对此提议断然表示反对。中国代表也认为此项提议与《开罗宣言》精神相悖，因而力加反对。施肇基会后探询杰塞普的意图，杰塞普答称，本年盟军进攻欧洲，死伤必多，将来美军进攻菲律宾及太平洋诸岛，倘若死伤过多，战事拖延过久，或许不免会引发美国民众的厌战心理，若届时日本缓和派提出适当条件，难免会有一部分美国民众会起而耸动政府以对日妥协。施肇基认为，就目下情形而言，这种设想虽未免过虑，但不可不引起注意。（二）关于英国对太平洋政策，施肇基认为，英国仍遵循以航海安全及和平贸易为出发点的传统政策。英国渐倾向于国际集体安全，以代替英帝国内部之相互保障。英对华政策，与对其他西方各国同，当视将来世界情形，再作具体的决定。（三）关于战后日本之待遇问题。英国代表主张暂时以军队占领日本。认为日本退于本土后，将不再成为和平之威胁，因此不必再取极端压迫手段。美国代表主张扶植日本内部之和平派，对日本民众，不采取报复手段，同时，维持其生活程度。对于铲除日本军事工业问题，全体代表意见一致。但对于日本之重工业，英国代表认为不必铲除，美国代表中亦有一人认为不必要铲除。中国代表声明，为中国将来的安全起见，不能不主张对日本有相当的限制与保证。此外，将来若日军和平退出中国，则中国人民对日本当采取较为缓和之条件；若日军败退前，任意戕杀毁坏，则中国人民，必要求对日本实行严厉之处罚。将来对日之具体条件，除特殊情形外，似可以盟国对德之条件为标准；至其他善后事宜，中国政府与人民，愿意与盟国共同商定，以谋求世界和平永久保障之建立。（四）殖民地问题，英国代表认殖民地问题为内政；同时，亦提出应逐渐给予各殖民地以充分自治权，并提高社会经济生活程度；法国代表坦承过去对越南政策之失败，表示战后应与中国密切联络，给予中国交通运输之便利，并答应开放河内为自由港。中国代表声明，蒋介石多次宣言，对邻国无领土野心，对太平洋各属地内政，亦无意干涉，但中国政府对南洋各地侨胞的利益，自有关切之责任。战后，各国应尽早废止歧视华人之律例。华侨利益，应予尊重。（五）太平洋国际安全问题，美国代表

颜露尔主张，将来国际安全组织，应由四强领导。美、亚、欧各洲，另设立评议会。重大国际问题，由大会决定；局部问题，由评议会处置。主张于军事要地，设立海空军根据地。但不赞成设立国际警察。澳大利亚、加拿大代表，反对将来国际组织由四强领导，主张大小国家，平等参加。英代表认国际组织，不应专注于安全问题，也应注重发展各国人民之福利。（六）关于中国现状，会上涉及此问题的主要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总干事卡特和研究干事霍兰德的报告。1943年夏，卡特、霍兰德为美国联合援华会以及太平洋国际学会工作事务，到中国访问，他们到了重庆、昆明、桂林、香港等处，与中国会员及学者，美国驻华军事、外交人员都有接触，并受到蒋介石等人的接见。此次，他们在亚特兰大会议上报告了对中国之行的印象。卡特提及，蒋介石对国外局势非常关注，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亦感兴趣。霍兰德报告，中国目前的问题为，经济上的通货膨胀严重影响生产效率与人民生活，公教人员所受影响尤甚；交通阻碍导致教育界不易与外国交换知识；国共两党间关系仍很紧张。美国代表对未来国共关系之走向十分关心。中国代表提出，蒋介石曾宣言，共产党问题系政治问题，当由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外界有关国共关系的传言，多不符合事实，且有恶意造谣者，应不足信；且这是内政问题，不在本会讨论范围之内。关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九届会议，议决1945年1月在北美举行。大会员国选派代表十五至二十人，小会员国选派五至十人。会议的总议题为“太平洋之安全及发展”，具体问题包括：（1）1944年各国之重要发展；（2）日本之将来；（3）太平洋各国经济复兴与发展；（4）各国文化及种族关系；（5）各属地的未来；（6）安全问题。^①宋子文复将施肇基的报告择要呈报于蒋介石。蒋梦麟等亦向其呈送下届会议议题及讨论大纲，同时提出，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邀请刘驭万出国住印度一个月，住纽约五个月，以襄助会议筹备事宜，请求许可，获得蒋介石的批准。

二 弗吉尼亚温泉城会议

1. 国民政府的会议准备

3月，朱世明呈报蒋介石，太平洋国际学会即将召开的会议性质重要，

^① 《施肇基报告太平洋国际学会讨论要点》（1944年1月26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长卡德及秘书何伦报告去夏被邀来华情形》（1944年1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6。

并请求指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负责筹办。蒋介石随即命军委会参事室负责准备事宜，并会商于中央设计局秘书长熊式辉。其代电曰：“参事室王主任雪艇兄并转熊秘书长天翼兄钧鉴：下次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已定于明年正月在北美举行。其议题为战后太平洋区之安全及繁荣问题，内容包括联合国太平洋作战联系机构问题、战败日本之处置、集体安全、国际警察及海空军根据地分配等问题。其重要性较以前历次会议均为过之。而该会议在英美各国左右政府外交政策之力量亦甚重大。我国分会已在重庆组织研究会，从事研究，惟此项准备工作可由参事室负……（注：以下原档案缺页）。”^①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奉命筹办，并与熊式辉、中国分会接洽。11月初，蒋介石亲自召集参事会研究对于太平洋学会会议之指示案，对于战后日本国体问题，蒋氏坚主由日本国民自决。^②至12月初，蒋介石批复王世杰所拟定的指示案曰：“所拟《太平洋学会会议之指示案》甚中肯要，已密交蒋会长作为我国代表出席此次会议之准则矣。”^③根据该指示案，中国代表在方略上应注意以下原则：一、此次会议所讨论之处分日本及保障太平洋安全各问题，于中国有切身利害关系，故中国代表应特别注意，在会中应有坚定明确之主张；二、中国今后对外政策，须同时力图增进中苏及中英关系，中国代表之言论及态度，务须避免反苏或排英之嫌；三、中方参与会中各项问题之讨论，不专注于某一问题；四、中国内政在原则上应拒绝作为会议中议题讨论；五、与各国代表人士多进行私人接谈。在政策上应注重如下各点：一、战后必须彻底解除日本武装；二、为防止日本再兴军备，须管制其主要工业及军用原料之进口；三、战后必须于相当长时期内在日本本土驻军，由联合国共同负责，中国亦参加；四、日本属地及占领地之处置，应依照《开罗宣言》；五、日本国体及其他内政问题应依照蒋介石在开罗对美总统之谈话，即听由日本人民自决；六、日本侵略所造成的中国公私产业之损失，应以日本在华之公私产业抵偿一部分；七、太平洋区域内应设一区域组织；八、如联合国将设立国际海空军根据规定为一般义务，中国亦同意在其太平洋领土上设

① 《朱世明呈太平洋国际学会性质重要，由军事委员会参事会负责准备会商熊天翼》，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7。

② 《事略稿本》，1944年11月，第2页，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典藏号：002-060100-00194-008。

③ 《王世杰呈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事件之指示》，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卷名：《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7。

置；九、关于太平洋之殖民地及属地处置问题，中国原则上主张尽可能使当地人民早获政治自由，对于在政治上成熟之人民，应限期给予自主；十、战后应立即允许朝鲜独立；十一、中国对于东南亚关注出海通道、废除种族差别待遇、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三方面利益；十二、中国战后经济建设，基于如下原则：（一）在国家全盘计划经济之下，发展国营企业，同时奖励及辅助私人企业；（二）国营民营企业均欢迎外国资本及技术协助；十三、关于一般国际安全组织问题，中国代表的主张应与政府最近在华盛顿会议时所采取的保持一致。^①

蒋介石亲自圈定代表人选，并指定蒋梦麟担任代表团团长。张君勱向蒋介石毛遂自荐，被派为代表。陈果夫转来参政员、东北元老莫德惠推荐宁恩承担任代表的信函。宁恩承是辽宁人，曾是张学良的部下，出席过太平洋学会 1929 年京都会议。莫德惠的理由是，“太平洋学会亦应有一东北同志参加”。^② 蒋介石同意宁恩承充任代表，并命蒋梦麟先转告宁氏来见。此外，王世杰、陈布雷又推荐外交部东亚司司长杨云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秘书邵毓麟为代表。中国代表最终确定为：蒋梦麟（团长）、张君勱、钱端升、吴文藻、宁恩承、杨云竹、邵毓麟、叶公超、胡适、施肇基、张忠绂、浦薛凤、李干、李国钦、李卓敏、刘馥万、周鲠生、吴景超，共计十八人。其中，前八人由国内出发，后十人已在美国。在经费方面，国民政府批拨中国代表川旅费美金二万元，会议开幕前夕，又应蒋梦麟之请，加拨美金二万四千五百元、国币十万零五千元、印度币二万零三百盾。

12 月底，会议举行在即，外交部接驻英大使顾维钧密电称，英方对此次会议颇有准备，对于组织太平洋区域安全机构问题，拟订了详细的方案。蒋介石命王世杰等从速研究对策，王世杰指出，主要是英方主张第三项所谓“中国现尚薄弱，其地位可认为平等，其职权不能相同”存在问题，鉴于会议已经开幕，建议立即电告中国代表特别注意。蒋介石随即致电驻美大使魏道明，嘱转告中国代表注意此点，如英方有此种论调，中国代表应以正式及非正式方式向美、英及各国代表表示，在未来之太平洋安全机构中，中国與

① 《太平洋学会会议指示案》，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外交部档案，册名：《太平洋学会》，档案号：412/0030，影像号：11-NAA-02698。

② 《莫德惠致陈果夫函》（1944 年 9 月 14 日），《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7。

论决不能接受仅在形式上予中国以与英美平等之办法。^①

2. 温泉城会议的讨论

1945年年初，当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九届会议举行之时，形势较三年前上一届会议时，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二战各战场，盟国与轴心国的胜败形势已较明朗，战争之结束已不再显得遥遥无期。在欧洲战场，盟军自半年前的诺曼底登陆以后，逐步推进，但正在阿登战场遭遇德军顽强的抵抗；苏军已解放本土，继续在东欧逐步向西推进。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已连接遭遇沉重打击。盟国则通过召开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会议，为国际和平机构之建立奠定了基础。而对于中国战场来说，抗战已坚持了七年多，但不久前，刚遭遇了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在国际地位方面，虽然中国“四强”之一的地位已然确立，但由于军事的失利，以及国内通货膨胀、官员腐败、国共冲突，美英报刊对于国民政府的批评报道日渐增多。这些报刊舆论影响了国民政府的海外形象，令国民政府高层深感恼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1月6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九届会议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城开幕。学会的上一届会议，将大部分注意力置于如何增进联合国战略合作的问题上，而本次会议则主要关注战后问题，会议的主题为“太平洋之安全及发展”。这次会议共有来自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印度、泰国、朝鲜的近130名代表参加，国际联盟秘书处、国际劳工局、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组织派观察员出席。出席本届会议的印度代表团与上届相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尼赫鲁的姊妹邦第夫人（Pandit, Mrs. Vijaya Lakshmi）担任代表团团长。此次会议依然采取对外保密的方式。

中国代表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包括：

林维英：《中国和外国资本》

吴景超：《中国工业化计划》

陈序经：《中国与东南亚》

王铁崖：《在华外国人及外国企业现状》

浦薛凤：《最低安全保障——免于恐惧的自由》

^① 《王世杰呈顾维钧电告英方所拟太平洋区域机构之意见》，《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7。

周鲠生：《世界新秩序中的远东问题》^①

会议开始后，蒋梦麟、杨竹云定期将会议情形以电报形式向宋子文、蒋介石等报告。

(1) 战后日本之处置

会议首先讨论了“日本之将来”问题，这也是会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对于日军之溃退，各国代表看法不一，中国代表认为日军将凭借大陆以对抗，英美代表则多对此表示怀疑。与会代表大致得出如下共识：联合国须切实合作。日本如实行和平攻势，联合国应立即予以拒绝，直至其无条件投降为止。彻底解除日本海、陆、空军武装，并防止其重整军备。赔款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以金钱形式，并以保持东亚和平为准则，而不以报复日本暴行为目的。日本战败后，势必经历一个经济混乱期，联合国应于相当时期在保障东亚和平范围内，使其经济安定，保障其人民最低生活标准。但对于经济恢复的速度，英国代表与中、美两国代表观点稍有不同。有英国代表主张此经济恢复期时间宜短，中、美代表则主张须经历相当的一段时期。最后讨论的结果，英国代表无异议。战后盟国可移用之资本物资，应尽先供给中国之需要，不应供给恢复日本经济之用。对于天皇问题，英国代表倾向于维持，美国代表大多倾向于废除，也有美国代表与中国代表意见一致，主张由日人自决。对于日本委任统治岛屿，有中国代表提出由美国占领，澳大利亚代表主张由联合国讨论决定，为多数代表所赞同。此外，帮助日本政治民主化是会议的一个共识。总的说来，在处置日本问题上，中、美两国代表意见接近，对于不同意见，中国代表也避免与之直接冲突。此外，因此次会议并

① W. Y. Lin, *China and Foreign Capital* (Chongking: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5)。

Ching-Chao Wu, *Plans for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Chongking: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5)。

S. C. Ch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Chongking: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5)。

Wang Tieh-Yai, *The Status of Aliens and Foreign Enterprise in China* (Chongking: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5)。

Dison Hsueh-Feng Poe, *Security Minimum-Freedom from Fear* (Chongking: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5)。

S. R. Chow, *The Problems of the Far East in a New World Oder* (Chongking: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5)。

(主要参考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Ninth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ot Springs, Virginia, January 6 - 17, 194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5), p. 146.)

无苏联代表参加，因此苏联方面的意见不得而知，与会代表颇以此为虑，但都避免进行推测。^①

(2) 战后印度及东南亚各殖民地独立问题

关于“各属地的未来”问题，会议讨论的情形与上一届会议类似，美国、加拿大代表主张在印度及东南亚各殖民地实行种族平等，早予自治；英国、法国、荷兰代表则力图维持战前原状，主张实行渐进的改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印度代表亦对英国对印政策大加批评。^② 据说，会上对英、荷、法殖民政策的指责令三国代表十分恼火，甚至考虑过退出会议问题。^③ 中国代表则提出保障东南亚华侨利益。

(3) 集体安全问题

关于“集体安全”问题，各国代表主张，太平洋区域安全组织须与世界安全组织相配合，而以局部组织为世界组织在该区域之代理机构。而对集体安全问题的讨论主要围绕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提案展开。1944年8月至10月，美、英、苏、中四国代表在美国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提案》，为未来的联合国架构了基本框架。此次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上，许多代表指出敦巴顿提案的不足，认为有进一步澄清和改进的必要。例如，有代表提出国际安全体制应以道德为基础。而对于四强享有否决权问题，一些代表表示担忧，否决权会使世界组织自身面临破裂的危险。但也有些代表认为，否决权亦有其作用。^④ 有关四强否决权问题的讨论又涉及苏联对东三省政策问题。有西方代表提出，若苏联提出会被中国反对的要求，世界组织即难于应付。因此，希望中苏两国如有问题，宜尽早由双方和平商决。与会代表认为，四强竭诚合作，实为世界和平之关键。而会议又公认，中国之统一与盛强，尤为世界和平不可少之因素。私下里，不少西方代表与中国代表交谈，都对苏联态度表示担忧。^⑤

① 《蒋梦麟致外交部电》（1945年1月15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案，册名：《太平洋学会》，档案号：412/0030，影像号：11-NAA-02698。《杨云竹致重庆外交部部次长电》（1945年1月22日），同上。

② 《蒋梦麟致重庆外交部电》（1945年1月18日）、《杨云竹致重庆外交部部次长电》（1945年1月22日），同上。

③ William L. Holland, "A Carrier with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p. 38-39.

④ *Security in the Pacific*, pp. 104-126.

⑤ 《蒋梦麟致重庆外交部电》（1945年1月19日），《杨云竹致重庆外交部部次长电》（1945年1月22日），同上。

(4) 中国的经济建设

在“太平洋各国经济恢复与发展经济”圆桌会议上，中国代表详述中国的经济政策，及保护外国投资政策。有英美代表主张中国不应太侧重于重工业，应同时发展手工业及农业，俾能增加出口，换取机器。

(5) 关于国共关系

国共关系并未成为会上讨论的问题。然而，中国代表一开始即注意到一名来自重庆的“左倾”记者冈瑟·斯坦因 (Guenther Stein)，他以英国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据张君劭说，斯氏告诉他，将对中共问题有所发言。中国代表怀疑其是受中共之委托。后来在经济圆桌会议上，斯坦因曾批评国民政府，而中国代表予以反驳。^①

(6) 香港、外蒙等问题

此次会议亦讨论到香港、外蒙、新疆、西藏问题。时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参事的张忠绂自 1936 年后再度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他是在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后留在美国复出席此次会议的。在其后来的回忆录中，他提出，1945 年的这次会议让他感觉“左倾”势力颇大。他的依据是：会上对英国殖民政策多有批评；另外，“左倾”人士屡次将香港、蒙古问题提出讨论。有西方代表，如：会议秘书塔妈耶 (Frank M. Tamagna) 及拉铁摩尔表示支持外蒙独立，张忠绂随即予以针锋相对的反驳。当然，此时，包括张忠绂在内的与会代表均不知道，雅尔塔会议已秘密决议外蒙独立。关于香港问题，会前国民政府中枢已做出指示，中国代表对此问题暂时不必有所表示。然而，会中“左派人士”主张香港应归还中国，并再三追问中国代表的态度。“我在国内时原也主张暂时勿须因香港问题与英国冲突，但在讨论会议上，为局势所迫，感到中国代表，全装聋作哑，也不是办法。我乃声明，以个人立场表示意见：香港为中国土地，终须归还中国，盼望英国能本共同作战，改造战后世界的精神，与中国早日会商归还香港的办法。”^② 其发言虽未在中英代表间引发激烈论辩，事后却引起一名中国代表的指责，认为其发言与最高指示不符。中国代表团特为此事开会，吴文藻、蒋梦麟、叶公超都表示支持张忠绂的做法，此风波才不了了之。

① 《魏道明致蒋介石电》，1945 年 1 月 15 日，《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典藏号：001-060200-0007；蒋梦麟致重庆外交部电（1945 年 1 月 18 日）。

② 张忠绂：《迷惘集》，第 173 ~ 174 页。

张忠绂回忆，会议结束后，他因感觉到与会代表中“‘左倾’人士”增多，对国民政府持不友善态度。而向刘馥万建议：中国分会应退出太平洋国际学会，但没有结果。^①

第五节 尾声——交恶的开端

战争结束之际，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中国分会均已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其间，学会通过召集一系列国际会议，已在中国享有一定声望，与中国学界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关系。学会与国民政府，亦建立了友好关系。特别是在抗战时期，这种关系有进一步的发展。很多美国会员对中国的抗战持支持态度。中国驻美使领馆也与学会保持往来关系。如前所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少总学会的工作人员以及美国会员，参加了美国各援华组织，一些人来到中国从事中美战时合作工作。

一 抗战后期太平洋国际学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摩擦

但从抗战后期起，太平洋国际学会国民政府之间的冲突、摩擦开始出现，且不断增加，一些西方会员的言论使国民政府日渐感到，太平洋国际学会已不再是一个友好的国际组织。

如前所述，二战结束前夕太平洋学会所举行的第九届会议上，张忠绂感觉到与会者中“‘左倾’人士”增多，对国民政府持不友善态度。事实上，早在194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摩擦即已出现。1943年，美国会员毕森（T. A. Bisson）在美国分会的机关刊物《远东观察》（*Far Eastern Survey*）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在联盟战争中的角色》，提出有两个中国：国民党中国和共产党中国；他对中共在根据地施行的政策大加赞扬，而对国统区的政策提出批评。^② 这篇文章令重庆方面大为恼火。此事件发生后，恰值太平洋学会总干事卡特、研究干事霍兰德再度访华，如前所述，他们受到蒋介石等人的接见，后者表现出对于学会的兴趣。二人初到重庆时，因旅馆紧张，还被安排在嘉陵宾馆孔祥熙的私人套房。霍兰德认为，这种优待与担任孔祥熙左右手的冀朝鼎

^① 张忠绂：《迷惘集》，第174页。

^② T. A. Bisson, "China's Part in a Coalition War", *Far Eastern Survey* (July 14, 1943).

有关。^① 原因或许不止于此，不过此事反映出此时学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尚未受很大影响。

然而，此后类似的事件一再发生，无论《太平洋事务》、《远东观察》、《美亚》（一些美国会员自行创办的杂志）上所刊载的文章，还是太平洋学会所举行的会议，都不时出现对国民党的批评声音。其所批评者，无非国民政府作战不力、经济崩溃、贪污腐败，以及国共冲突不断。到国共内战时期，事态似呈愈演愈烈之势，导致国民政府与太平洋学会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并严重影响了学会与其中国分会的关系。当然，在这段时期，海外对国民党的批评言论，并非太平洋国际学会所独有。自抗战后期起，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对国民党的批评声音日渐增多，乃是美、英各大报刊的一个普遍现象。许多来华西方人士，亦持类似的看法。来自太平洋学会美英会员的批评仅反映了一些会员的个人意见，学会本身一向注重遵循中立原则，避免采取政治倾向与政治立场。何况这些言论即便对国民党提出批评，也不一定意味着同时对中共持赞赏态度。然而，到 1950 年代，太平洋国际学会，以及其大批美国会员，被麦卡锡主义选作攻击的对象，学会被指控为受到了苏联、共产党的渗透，并要为“丢失中国”负责。长期的调查致使学会受到沉重打击，最终宣告解体。后面的历史之所以有如此的发展，是由各种因素累积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自然是冷战的国际局势；此外，学会亦如那些“中国通”一样，被指要为“丢失中国”负责，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替罪羊。当然，也有学会自身的因素，其中之一是，该学会，特别是其美国分会，因其对远东太平洋问题研究的专业地位，引起了美国公众及政府的重视，在二战前后，美国分会与政府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对公众舆论及政府政策走向在事实上的确有一定影响力。此外，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中的确有人是共产党员，例如中共地下党员陈翰笙、冀朝鼎曾参与学会的研究及编辑工作。^② 关于

① William L. Holland, "A Carrer with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 30.

② 陈翰笙曾于 1933、1936 年两度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学会会议，1936 年，他由苏联前往美国参加《太平洋事务》的编辑工作。据他回忆，拉铁摩尔担任《太平洋事务》主编后，感到人手缺乏，向学会要人，作为会员国的苏联推荐他去（见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四个时代的我——陈翰笙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第 61 页）。但霍兰德对这种说法表示不解，其理由大致为，苏联分会与太平洋学会关系一向较疏离，其时，甚至未曾出席过学会会议，学会负责人如何会在人事问题上听从苏联方面的意见？（"Appendix Two: Holland-Hoover Interviews", in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The Memoirs of William L. Holland*, pp. 380 - 381.）

1950年代美国参议院麦卡伦委员会（the McCarran Committee）对于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调查，学界已有不少研究工作，当事人亦留下了大量详细的回忆，况且也逸出本书所讨论的范围，此处就不赘述。^① 不过，仍有几个线索值得稍做梳理。

也是在1943年，卡特与霍兰德访华期间，出席了美国联合援华会在重庆召集的会议，卡特是该会负责人之一，围绕该会内部事务，该会成员阿尔弗雷德·柯伯（Alfred Kohlberg）对卡特产生不满。柯伯是一个在中美之间从事纺织品贸易的商人，也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会员。1943年会议时，柯伯表示，将对太平洋学会美国分会的“亲共”倾向采取行动。^② 从1944年年底开始，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里，柯伯展开了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的攻势，他散发了一份88页的材料，指责学会“亲共”，并得到两家美国杂志的支持。1947年春，作为应对，美国分会举行了全体会员投票，就学会是否“亲共”进行表决，结果以压倒性多数意见否认了这一指责。同时，学会还获得了许多远东问题专家的具名支持以及一些重要报刊的支持。太平洋学会也将此事经过通告给各国分会。再度担任中国分会会长的胡适也收到相关文件。^③ 事实上，在1945年春，学会即为应付柯伯的指责制定了措施，卡特致信中国分会在美国的代表李国钦，征询其意见。^④ 李国钦对卡

① 关于此问题，可以参见：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编《太平洋学会调查报告》，黎明公司编辑部译，“近代史丛书”7，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责任公司，1973；罗斯·Y. 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张晓贝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费正清：《费正清自传》，黎鸣、贾玉文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陈同、罗苏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斯·菲尔德：《从右到左：我的自传》，竞芸、芦荻生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李玫蓉：《太平洋学会与美国对华政策（1941~1949）》，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9年；*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The Memoirs of William L. Holland*；J. N. Thomas,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sian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Robert P. Newman, *Owen Lattimore and the "Loss" of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等。

② William L. Holland, "Recolle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 88.

③ "Documents of the Official Letters of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6".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档案号：E0475-001。

④ 李国钦是美国华侨，华昌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多次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亦充当中国分会在美国的代表，此时担任总会的财政委员会主席。他与胡适以及孔祥熙、宋子文等关系密切，在国民政府争取美援活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特表示，关于如何应对处理柯伯的指控问题早应在温泉会议上由全体代表决定。同时，他对太平洋学会的政策批评道：“我依然认为，在影响远东的重要冲突问题上，太平洋国际学会可以主要通过采取明确、积极的姿态，以为和平做出最大贡献，明确地表达意见，可以消除误解，有助于舆论之形成。”“目前的事在我看来尤为不幸的一点是，它是以中国为代价。无论这项指控被证实或者证明不成立，无论一个人偏袒与否，都将损害中国的利益。出于此原因，也因为涉及到我的国家，我不介意加入（学会的应对措施）。”^①然而，柯伯的攻击所造成的影响是无法消除的。

1946年3月，国民政府外交部接驻纽约总领事报告称，太平洋学会为若干“左倾”之中国问题专家所盘据，对国民政府肆意攻击，中国与该会之关系，似宜重新考虑。外交部训令驻美大使馆及各领馆，如再发现攻击国民政府之言论，应根据事实予以驳斥，并具报。^②

一方面，国民政府加强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警惕；另一方面，中国分会也对太平洋学会的一些政策不满。

据张忠绂回忆，1945年温泉会议后，他因感觉到与会者中“‘左倾’人士”增多，而向刘驭万提议，中国分会应退出太平洋国际学会，但后者并未听从。张忠绂的回忆录出版于1970年代末期，冷战尚未结束，麦卡锡主义指控太平洋学会的阴影亦未消散，因此，他对此次会议的回忆或许不免带有一定时代的印记。但从刘驭万会后的感想来看，张氏的回忆大体上应是可靠的。由美国回国后，刘驭万致函胡适，感谢他对中国分会的帮忙，提及中国分会“仍是你的婴儿”，但同时抱怨道：“在数方面，我对此次美国之行不满意。会议一无是处，太平洋国际学会糟糕，中国分会则更糟。有时，我几乎觉得受够了。”^③不过，随后，他又致函胡适，表示他会让中国分会继续下去。^④

另一个引发中国分会与总会之间矛盾的问题是会费。抗战期间，中国分

① K. C. Li to E. C. Carter, March 13, 1945.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档案号：E0146 - 001。

② P. H. Chang to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arch 4, 1946.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案，册名：《太平洋学会》，档案号：412/0030，影像号：11 - NAA - 02698；《外交部致驻美使领馆训令》（1946年3月11日），同上。

③ Liu Yu-wan to Hu Shih, March 6, 1945.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档案号：E0275 - 007。

④ Liu Yu-wan to Hu Shih, April 19, 1945,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档案号：E0275 - 007。

会虽获得国民政府对其出席国际会议的补助，但其经济困难问题并未解决，尤其从抗战后期起，筹措每年给总会的会费成为中国分会所面临的一大问题。1944年年底，在美中国会员为筹措会费而进行会商，刘馥万等决定以四名在美执行委员的名义，致函正在访美的孔祥熙，由夏晋麟面交。但是，担任司库的陈光甫不赞成向孔请款，而主张个人捐款。一年后，中国分会再次为筹措会费而发愁。1945年年底，学会总干事卡特再三向中国分会催缴第九届会议上所允诺的会费，随后与中国分会发生了争论。李国钦在致胡适的电报和信函中，一方面批评卡特在此事上的做法以及学会的政策；另一方面又提出：“我们不能把对学会政策的批评与会费问题搅在一起。”^①在向政府请款问题上，李国钦的意见与一年前陈光甫的相近，他提出，中国分会不应该收取政府的补助金；而应如英国、美国分会那样，将一批对学会事务感兴趣的人聚合在一起，由其认捐。“然后，我们方能按照我们的自由意志发言，这将对太平洋理事会及世界的大贡献。”^②他还告诫，不能重拾昔日日本分会及苏联分会对待太平洋学会的态度。

二 1950年中国分会退出太平洋国际学会

战后，尽管与总会有一些摩擦，但中国分会的各项事务照常进行，且依旧维持与总会的正常往来。抗战胜利后，中国分会复员回到上海。执行委员会届满举行了改选；执行干事一职则因刘馥万出任驻汉城总领事，而由刘裕棠接任。1947年年初，已担任学会总干事的霍兰德访问中国分会，鉴于人事变动等原因，他对中国分会能否恢复战前的位置心怀疑虑。^③然而，在此时期，中国分会的确提出过一些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它亦筹备并出席了学会1947年在英国举行的第十届会议及其他会议。中国分会与总会之间的关系最终因政局之影响而宣告终结。1950年，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十一届会议计划于印度举行，此时，中国的政局已发生剧变，一部分中国会员留在大陆，而更多的会员及分会执行委员已到台湾、香港、美国等地。太平洋国际学会筹备此次会议时，曾讨论过是否向新中国方面发出邀请问题。胡适、蒋梦麟等中国分会领导成员对此表示抗议，并最终决定中国分会退出太平洋国

① K. C. Li to Hu Shih, Jan 24, 1946.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档案号：E0269-001。

② K. C. Li to Hu Shih, Feb. 8th, 1946, 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档案号：E0269-001。

③ William L. Holland, "A Career with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 50.

际学会。^①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就此宣告终结。

当然，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中国事务及国民党之间的瓜葛远未结束。1950年，美国参议员麦卡锡（Joe McCarthy）指控拉铁摩尔、杰塞普等人是苏联代理人。他对拉铁摩尔的一些指控，承继了柯伯此前的意见。据说，柯伯将他所收集大量相关资料交给了麦卡锡。^② 大约在1949年11月至1950年，柯伯与台湾方面也联系紧密，多次向后者提供关于美国某中国问题专家或某远东政策负责人是否“亲共”的意见。^③

自1950年起，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美国会员——其中不少人是远东问题专家及曾参与制定远东政策的政府官员，包括拉铁摩尔、杰塞普、卡特、霍兰德、费正清、菲尔德（Frederick V. Field）等——受到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调查。长期的调查终于拖垮了太平洋国际学会，到1950年代末，学会事实上已停止活动，最终于1960年宣告解散，其多年积累下来的图书、资料及刊物，分别转入美国、加拿大数家知名亚洲研究中心。

三 1970年代台湾批判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风潮

不过，到了1970年代初期，台湾又出现了一次对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分子（尤其是费正清）的批判运动。一批相关批判书籍和文章付诸出版，其原因就正在于时值中美建交前后，而这种看似“翻旧账”的举措，正如台军事部门给蒋经国的一份报告中揭示的，是“为扩大心防及宣教影响”，适应“政治作战”的需要。^④

① William L. Holland, “A Career with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 57.

② William L. Holland, “A Career with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Remembering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 59.

③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档案，册名：《太平洋学会》，档案号：412/0030，影像号：11 - NAA - 02698。

④ 国防部参谋总长高魁元呈总政治作战部译印之《远东是怎样失去的》、《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太平洋学会调查报告》及《〈美亚报告〉中国灾难之线索序文》三书（1970年6月9日），《军事——国军重要主官暨幕僚调任计画暨候选名簿（一）》，台北国史馆藏蒋经国文物，典藏号：005 - 010202 - 00040 - 009。